
最近日本外交動態評析

朱少先

一、前言

日本首相鈴木善幸爲人正直，態度溫和，生活淡泊，做事有耐心，善於協調糾紛，人緣亦佳，頗得各方好感。他從一九四八年由社會黨改入自由民主黨前身之自由黨後，已先後當選了十四屆衆院議員；自一九六〇年出任池田內閣郵政大臣後，也擔任過官房長官、厚生大臣、農林大臣等閣僚職務，但政績平平，無特殊表現。惟在自民黨內，渠任總務會副會長、會長，前後達六年八個月之久，曾多次協調黨內糾紛，頗多貢獻，一九七八年大平正芳組閣時，原有意起用鈴木爲幹事長，但當時福田、三木兩派，認爲鈴木與田中角榮過份接近，極力反對而未果。惟鈴木並未因此而與各方交惡，也不計較得失。去（一九八〇）年六月大平辭逝之後，自民黨總裁繼任人選，一致看好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及宮澤喜一等三人。其中中曾根在自民黨五大派①中是唯一尙未出任過總裁及首相的派系領袖；河本爲三木派大將，曾在一九七八年參加過總裁競選，雖然在預選中失敗，但頗獲財界領袖支持，勢力相當；宮澤爲黨內新秀，屬大平派旁系②，曾任外相與經濟企劃廳長官，幹練有爲，惟在黨內從未擔任過要職，又未獲大平派一致支持；故當時形成了中曾根與河本對峙局面。

由於去年六月二十二日日本參衆兩院議員同時選舉結果，自民黨竟出現意外的大勝，在衆院五一一席中，獲得了二八四席，較選舉前增加了二六席，連同選舉後獨立派議員加入自民黨三人，該黨在衆院總議席已達二八七席，參院半數選舉，亦增加了一

註① 自民黨內派系林立，但較具實力者，計有大平、福田、田中、中曾根、三木等五大派，其中大平、福田、田中、三木四位派系領袖，均已先後當選自民黨總裁而出任首相，只有中曾根康弘尙未當過總裁與首相。

註② 大平正芳、宮澤喜一原屬池田勇人派，池田逝世後，該派由前衆院議長前尾繁三郎繼池田領導，但不久即爲大平取代，成爲大平派；因前尾領導池田派時，官澤與前尾接近，故大平派成立後，官澤等仍隸大平派，但已列入旁系，與大平嫡系，不甚融洽。

一席，連同未改選席位，在參院二五二席中，亦佔一三五席。因此，自民黨在國會已佔有絕對優勢，恢復了一九七二年佐藤榮作首相辭職前之雄風。

改選後自民黨內派系勢力，亦有了若干變化，在衆院大平派佔五五席、田中派五三席、福田派四六席、中曾根派四四席、三木派三三席、中間派及無派系者五六席，因大平派已躍昇為第一大派，雖尚無法推舉出一位共同支持的領袖，但也不願將總裁職位，輕易讓出，結果以大平派嫡系田中之助為中心，經多方協調，擁戴鈴木善幸為領袖，再以「團結自民黨保守本流」^⑤為號召，秘密拉攏福田、田中兩派，形成「大福角」（大平、福田、田中角榮）體制。因該三派在黨內擁有三分之二以上議席，遂使鈴木後來居上，以黑馬姿態，壓倒了中曾根和河本，當選了自民黨總裁而出任日本首相。

就鈴木本人言，向以作「和事佬」自甘，從未作領袖羣倫之想，此次被推上自民黨總裁寶座，亦為始料所未及。當去年六月二十六日自民黨召開最高顧問會議^⑥時，會中雖贊成以協商方式推舉單一總裁候選人，但前尾前衆院議長曾認為鈴木並非可以負責推薦的對象；惟協商結果，多數傾向鈴木，也只好遷就現實。這裏說明了鈴木並非是真正適當的總裁人選，不過是時勢造英雄而已。

鈴木就任首相後，在內政上強調「融和的政治」，即促進黨內、國民及在野黨間的對話，實現公正的融和和政治；以鈴木過去的政治經驗與協調手腕，當可發揮其特長。惟鈴木對外交，完全外行，故在組閣時起用大平內閣官房長官及代理首相伊東正義為外相及曾任外長之宮澤喜一為官房長官，顯示鈴木仍將繼承大平外交路線，並藉其與宮澤的姻親關係，借重後者之外交長才，輔佐首相，推行外交政策。

本文主要目的在評析日本最近的外交動態，其所以先敘述鈴木善幸個性、才能及出任首相經過，旨在說明鈴木在此激動的一

註⑤

自由民主黨係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保守派的「自由」、「民主」兩黨合併而成。自由黨原由吉田茂所領導，佐藤榮作、池田勇人均屬吉田門生，岸信介與佐藤又屬同胞兄弟，成為自民黨保守「本流」。民主黨總裁為鳩山一郎；兩黨合併時，由鳩山一郎、緒方竹虎、三木武吉、大野伴陸集體領導；一九五六年四月鳩山繼吉田出任首相後僅八個月，即因病辭職，由鳩山派的石橋湛三繼任，但也只做了三個月，亦因病由岸信介接任；自此以後，由岸信介（一九五七年三月）而池田勇人（一九六〇年七月）、佐藤榮作（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田中角榮（一九七二年七月）等「本流派」執政，前後達十七年之久。一九七四年田中為了「金脈事件」下臺後，大平與福田「兄弟」相持不下，乃由推名悅三郎（原屬岸派）裁定，由三木武夫（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繼任首相；三木原屬舊民主黨松村謙三派，故被指為「自民黨保守旁流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因大選失敗，引咎辭職，再由「本流派」福田赳夫出任總裁及首相；兩年後在預備選舉中大平擊敗，由大平執政。大平雖屬本流派，但自一九七二年佐藤辭職後，先是田中福田之爭，繼之福田大平之爭，其間本流派內部，已鬧得不可開交，而且為了爭奪首相職位，田中、福田、大平、三木、中曾根（中曾根原屬河野一郎派，亦即鳩山一郎「自民黨旁流」）間，不分「本流」、「旁流」，只有為利害而結合，直至大平猝逝，為繼任總裁問題，才促成了「田中」、「福田」、「大平」本流三派結合，重建了鈴木政權，但能維持多久。仍屬疑問。

註⑥

自民黨最高顧問包括福田赳夫、三木武夫兩位前相及前尾繁三郎、灘尾弘吉兩位前衆院議長。

九八〇年代國際情勢中，是否能使日本在亞洲擔當一重要的角色，爲亞洲和平與安定，作出貢獻。

作者在本刊第二十卷第六期（一九八一年三月號）曾發表「鈴木訪問東協五國的剖析」一文；並在該文中特別強調鈴木一反日本外交傳統，不首先訪問美國，而選擇了東南亞國協五國作爲就任後外訪的第一站，除了歷練其與各國首腦會談的經驗外，並欲藉「東協」訪問的成果，提高其國際聲譽，進而增加其在未來的「日美高層會談」、「南北會談」、「七國高峰會談」的地位與發言權。上項安排，也許是出於宮澤官房長官的設計。事實上，鈴木東協之行，因有利於東協，成功公算極大；且因鈴木在訪問中，曾對東協五國，在經濟援助及經濟合作上，有大幅度承諾，並保證切實付之實施。不論這些承諾能否真正兌現，至少在現階段，鈴木的「東協」之行是一次成功的訪問，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作者於慶幸鈴木在外交上「旗開得勝」之同時，更盼其在宮澤官房長官伊東外相輔佐下，今後能更進一步展開外交工作，站在亞洲最重要一員的立場，爲亞洲和平與安定，作出更多貢獻。但最近日本在外交上的若干作爲，却表現了搖擺、矛盾，已陷日本外交於徬徨歧途之中，不但使作者失望，也使我們感到非常憂慮與不安。

下面試就最近日本外交動態，扼要評析。

一、錯誤百出的對中共政策

一九七二年七月田中角榮繼佐藤榮作執政之後，外受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及中共混入聯合國的影響，內受左翼政黨、親中共人士的壓力以及利慾薰心財界的慫恿，竟罔顧國際信義，於同年九月率同大平外相訪問北平，搶先美國與中共建交，除了表示在外交上獨立姿態外，並企圖獨霸大陸市場。雙方建交後在貿易方面確有相當增加，貿易總額由一九七二年的十億餘美元，增爲一九七八年的五十餘億美元；加以自一九七三年起，中共原油對日輸出一百萬噸後，逐年增加，至一九七八年已達七百萬噸。在國際能源危機中，這對日本頗具誘惑力。因此在一九七八年二月，雙方又簽訂了一項民間「八年長期貿易協定」（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所定貿易總額雖僅二百億美元，但協定內容非常特殊，規定日本對中共輸出以工廠設備爲主，約佔七、八十億美元，其餘二、三十億美元爲建設用資材及機械類；且爲配合中共「四個現代化」，前項資材，將集中在一九八〇年以前輸出。中共則以輸出原油、煤炭予以抵償，規定從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的五年內，輸日原油四、七一〇萬噸（自一九七八年的七百萬噸逐年增加，至一九八二年爲一千五百萬噸）、煤炭約九百萬噸；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輸出數量，在一九八一年內協商決定，實際上有關日本輸出的各項工廠設備契約，包括年產六百萬噸的上海寶山煉鋼廠及若干石油化學工廠等大工廠在內，均已在 一九七八年內完成，並已開始陸續在大陸各地建廠；但從去年十一月開始，中共以財政困難通貨膨脹及原油減產爲理由，未經協商，即通知日方，中止寶山煉鋼廠第二期工程之進行，繼之又撕毀了南京、山東勝利、北京東方三大石化

學工廠等十五項建設契約，總值在三千億日元以上（約合十五億美元）。因為承包此項工廠之企業，除已將各項設備運交中共且正進行施工外，其餘所需器材、機械，亦均完成設計及發包工作，現在突遭單方面通知中止契約，受損者不僅是與中共簽訂契約之廠商，就連有關企業，亦均波及，甚至有被逼倒閉可能。鈴木政府鑒於問題之嚴重，即於本年二月十日派大來前外相爲政府代表，趕赴中國大陸，與中共當局談判。當大來與谷牧會談時，中共除了說明財政困難、原油減產等原因不得不中止各項大型建設外，表示將依國際慣例作適當補償；並將派代表赴日，與有關企業協商。鄧小平在與大來會談時，又提出了「如果日本政府提供低利貸款或雙方合辦方式，原有建設計劃，仍可繼續進行」等構想，其用意是想把這筆爛債，推到日本政府身上。甚至最近中共方面更傳出「中共與日本簽訂『和約』時，曾放棄百億美元賠償要求，區區十五億美元，又何必如此緊張」之說，頗有賴債之意，大來返國與鈴木會商後，決定由民間先行協商解決。中共方面在二月二十四日派「中國技術輸入總公司」副總經理劉興華赴日，與日本有關企業協商，先後曾與二十六家企業負責人會商，除說明中共實際困難要求日方諒解外，對補償具體辦法，始終未見提出，使各企業甚感失望與恐慌。劉興華訪日毫無結果，已於三月十四日離日。鈴木政府不得不再邀請谷牧訪日，再作具體商談。日本政府能否如鄧小平所言，對中共提供鉅額低利貸款，內部意見亦未一致；即使提供借款，中共當局能否繼續完成未了工程，亦大有問題；故此一事件，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境，惟日本對中共一向存有幻想與野心，迄未放棄。前（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大平前首相訪問中國大陸時，已同意協助中共開發煤礦，提供每年約五、六百億日元低利貸款，爲期五、六年，總額約爲三千億日元（折合美金十五億元）；其第一、二期貸款共一、〇六〇億日元，業已照付。惟中共輸日原油及煤炭，均未照原定數量提供；尤其是原油，今年原應輸日九百五十萬噸，因中共減產關係，至多也只能供應八百三十萬噸。在此情況下，日本政府如再予中共以鉅額貸款，勢將愈陷愈深。

根據鈴木內閣主管經濟事務的「經濟企劃廳」長官河本敏夫今年三月十二日表示，日本與中共關係，具有長期目標，在中共經濟遭遇困難時，日本應予援手；如果中共提出要求長期低利貸款，俾使各項已中止之建設計劃重行恢復，自應積極協商解決。在另一方面，據半官方的「貿易振興會」報告，日本正以巨額資金，協助中共在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開發農業，計劃開墾土地面積達六百餘萬公頃，並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完成。這些事實，都表示了日本欲獨霸大陸市場及重返東北的幻想與野心，頗值得警惕。

日本基於這些幻想與野心，在外交上處處拉攏中共，討好中共。根據三月四日「讀賣新聞」報導，伊東外相於同月下旬及鈴木首相於五月訪美時，將強力要求雷根政府維持美國對中共的一貫政策，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基於對蘇戰略，認定中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美國如進一步改進與臺灣關係，勢必刺激中共，對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安全保障，將有莫大影響。雖然由灘尾弘吉所領導的「亞洲問題研究會」及「日華議員懇談會」，已正式警告鈴木政府，中止此項愚蠢行動，但能否改變

鈴木政府態度，甚難逆料。

雷根政府的「遠東政策」，仍以去（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五日發表的五項指導原則^⑥為基礎，其中第一項已明白指出「美國與中共關係是屬於戰略性、全球性的，當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時，將把範圍擴大至全體中國人」。第二、三兩項也明白指出美國保證與日本、中共、韓國、中華民國合作，致力於西太平洋和平與經濟發展，堅決抵抗侵略。對中華民國將依照「臺灣關係法」發展與臺灣關係，且不受外國干涉。（第四、五兩項）。這些原則並從雷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艾倫於今年二月六日再予確認。鈴木政府應早就了解，雷根政府之遠東政策方針，為何還要「臺灣問題」在日美會談中提出建言。除了日本想討好中共外，實在想不出其他理由。

再就日本本身言，臺灣戰略地位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無人能加以懷疑，而且目前日本與中華民國之間的經濟、文化關係，非常密切。鈴木、伊東等如果昧於此等事實，而作出不利於中華民國之言行，亦屬令人費解。

三、進退失據的對美外交

日美關係是日本獨立後的外交基石，戰後藉日美安保條約及核子傘維護，始能無後顧之憂的發展經濟，並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已成爲自由世界第二號經濟大國。一九七二年七月田中執政後標榜「獨立自主」外交，搶先美國承認中共政權，以示擺脫美國在外交上的羈絆，此事已造成兩國間的不快；加以兩國貿易，自一九六九年超，日本由入超轉爲出超，而且逐年增加，迫使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八月宣佈了八項新經濟措施^⑦，其中第二項實施一〇%的進口附加稅，便是完全針對日本而發。在一九七二年的日美貿易中，美國又有四十二億美元的逆差，使美日關係也陷入嚴重階段，尼克森乃在一九七三年世局咨文中，對日本提出了下列三點指責：「(1)日本多年來均賴日美安保條約保護，其在防衛雖亦作了若干努力，但其防衛經費仍不及GNP的一%；(2)日本是在美國援助下成爲經濟大國，但現在已變爲美國主要競爭者。因爲日本只顧本身利益，造成兩國間貿易不均衡現象。如果

註⑥

雷根在競選美國總統時曾宣佈當選後將恢復與中華民國官方關係，此項發言，曾遭到中共猛烈攻擊；因此才派了副總統候選人布希訪問大陸，加以解釋。布希返國後不久，雷根於八月二十五日在洛杉磯發表了一篇「遠東政策特別聲明」，其內容包括下列五項原則：「(1)美國與中共關係，對雙方利益均屬重要，是屬於全球性和戰略性的。當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時，美國將把友誼範圍，擴大至全體中國人，並將繼續擴大與大陸之貿易、科學及文化關係；(2)美國保證與日本、中共、大韓民國、中華民國合作，致力於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經濟成長；(3)美國將與這個地區內的所有國家，進行合作與協商，共同努力以堅決抵抗侵略或霸權之追求；(4)美國將根據「臺灣關係法」發展與臺灣關係；(5)美國總統執行美國法律時，將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的干預。」

註⑦

請參閱本刊十二卷七期拙作「轉變中之日美關係」一文（第十九頁）。

雙方不斷發生經濟爭執，勢將威脅到兩國政治關係；(3)日美同盟關係，決不能基於自身利益採取獨自之政策。吾人不能因短期政策而影響長期團結；更不能因競爭利益目的，而威脅政治合作的共同目標。上項嚴厲措詞，已顯示了日美關係的嚴重程度。田中以後的歷任日本首相，雖仍強調日美關係的重要性，但迄未改變其爭取經濟利益的對外政策；尤其日本汽車在美國的傾銷，構成了對美國的嚴重威脅，也使兩國在經濟上的摩擦，愈來愈大。在兩國防衛關係上，自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及日本與中共建交後，蘇俄在遠東積極擴張軍力；尤其是一九七八年日本與中共簽訂包括「霸權條款」的「和平友好條約」及同年底美國又與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後，蘇俄在遠東的軍力，已構成對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去年日本防衛廳所發表的「防衛白皮書」指出，蘇俄地面部隊已有四十六個師四十五萬人配置在中俄邊境，其中三十四個師配置在遠東，裝備精良，且擁有移動式中距離新型核子飛彈「SS-20」；航空兵力，在遠東已配置二千六十架各類新型飛機，其中還包括了逆火式超音速轟炸機；海上兵力擁有各類戰艦七八五艘，「明斯克」號航空母艦，亦已進駐遠東；在印度洋與南中國海，經常保持四十艘以上艦艇。自中共對越南發動所謂「懲罰戰」後，蘇俄在越南已可隨時使用全部海空基地。自由國家海上交通及日本賴以生存的自中東經麻六甲海峽的石油資源通路，亦隨時有被切斷危險。此外在日本北方四島的國後、色丹、擇捉三島，蘇俄也進駐了一個現代化師，故日本已直接受到威脅。而美國本身因國力日衰，海上兵力，已逐漸被蘇俄所超越^⑦。自阿富汗、伊朗問題發生後，美國第七艦隊必須兼顧波斯灣與印度洋兩方面，在西太平洋實力顯見減弱，故積極要求日本增加防衛力量，分擔防衛責任。去年五月大平訪美時，雖已同意將「中期業務計劃」(即自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四年的「五年建軍計劃」)提前於一九八三年完成，但其最後年度防衛預算，仍僅佔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即使如期完成，不僅無法分擔國際責任，連防衛本國，尚有問題，據去年日本「防衛白皮書」指出，日本陸海空自衛隊裝備落伍，後方支援補給體制亦諸多缺陷，彈藥儲備量五萬八千噸，僅够兩星期之需，足證其防衛力量，極為脆弱，而且日本自衛法規定，自衛隊受到奇襲時，第一線部隊無權立即反擊，必須奉到首相(最高統帥)指示，始能採取行動。一九七八年栗栖統幕議長(相當於聯合參謀會議主席)因主張自衛隊應有超越法規立即應戰之權而遭罷黜，足證日本防衛問題，漏洞百出，困難重重。在今年五月舉行「日美高層會談」中，防衛問題將成爲首要議題。鈴木將如何解決此一難題，一直在苦慮之中。爲了切實了解美國意向及作初步協調，福田首相曾奉命以政府及自民黨領袖身份，於三月十七日飛美，與雷根總統及政府、國會議領袖晤談。福田的主要任務，在對八十年代的美國世界政策，經由與美國領袖接觸，獲得了解，俾供鈴木政府作爲釐訂政策之依據。二十一日伊東外相的華府之行，却是爲鈴木訪美鋪路，也將就日美兩國間的重大問題，初步交換意見。因此，福田、伊東美國之行，對未來「日美高層會談」，必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註⑦ 根據美國海軍作戰部長二月五日在國會作證時的公開表示，因爲俄海軍在去年一年間積極擴增，美海軍已失去優勢，並謂至一九八〇年代上半期，蘇俄海軍將顯著佔優勢地位。

到目前爲止，美國對日本要求增加防衛力量的主要理由，是基於世界戰略觀點。美方認爲日本既已成爲自由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自應負擔一個國家的責任，分擔西太平洋防衛任務。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曾表示：北大西洋組織（NATO）與日本爲了共同防衛，分擔美國的責任是不可或缺的，要求日本作最大限度的防衛努力。白宮方面也要求日本對防衛力作確實而顯著的改善；駐日美軍司令官奇恩更指出日本一九八二、八三年度國防預算有大量增加的必要；美國駐日大使孟斯斐德在三月九日又具體要求日本必須推進對本土及沿海防衛能力與防空能力的現代化。雖然上述一些零星報導，並未能代表雷根政府的整體意見，但在未來「日美高層會談」中，美方強力要求日本增加防衛力以分擔西太平洋防衛任務，已屬必然。至於日本政府的態度，伊東外相三月十日在國會答詢中，曾明白表示，日本因受憲法限制，僅能行使個別自衛權，無法參與集團防衛，因此在與對方協議時，準備明白說明日本專守防衛的基本立場，希望對方理解。鈴木首相答復美國「商業週刊」訪問時表示，日本雖將努力改善裝備，增強防衛力，但基於和平憲法，分擔軍事責任甚有困難，只能在經濟、技術方面，提供合作。一般認爲如果日本以「專守防衛」、「無核三原則」、「防衛預算限定GNP 1%」等立場參加「日美會談」，絕對無法滿足美國要求。對兩國關係前途，將有不良影響。至於日本汽車在美傾銷問題，雷根政府基於自由貿易原則，目前雖尚無設限計劃，但據可靠消息，在未來日美會談中，仍希望日本在今後三年內自動設限，對美輸出以每年一百六十萬輛爲最高額^⑧。故此一問題，似較防衛問題容易解決。

雷根總統就職後第二天，即邀請韓國全斗煥總統訪美，雖同日以越洋電話與鈴木首相會談，希望儘速舉行兩國高層會議，但已使日本失了先籌；實際上也是對鈴木一項警告，爲日美關係，投下暗影。因此使日本對美外交，已有進退失據之感。

四、前倨後恭的對韓外交

日韓兩國自一九六五年恢復邦交後，由於日本給與韓國「無償贈與」、「低利貸款」及「民間貸款與投資」等大量經濟援助，有益韓國經濟發展，兩國關係相當良好；自一九六七年起又有兩國定期部長會議之舉行，對促進雙方政治、經濟、文化合作，均有裨益。但不幸至一九七三年八月，發生金大中在東京被韓國中央情報部秘密綁架至漢城事件後，使兩國關係一度陷於停頓狀態。第七次部長會議，亦宣佈延期召開。其後雖經韓國總理金鍾泌赴日，與田中首相會談，獲得了政治性諒解，也勉強恢復了部長會議，但因金大中事件未獲澈底解決，兩國關係，仍處於不協調狀態中。直至一九七五年四月高棉淪陷，越南三邦完全赤化之後，東北亞形勢轉趨緊張，日本與韓國僅一衣帶水之隔，唇齒相依，非團結不足於自保，乃在美國斡旋協調下，兩國要員恢復互

註⑧ 根據華盛頓三月十六日《美聯社》報導，美國政府對日本汽車輸美，原則上暫不設限，但要求日本自行克制，以一百萬至一百六十萬輛爲度。並要求增加售價一二%至二〇%。惟衆院「汽車問題特別委員會」決議要求政府實施對日汽車探限制輸入政策，以五年爲期，每年至少輸入一百二十萬輛。

訪，民間也成立了「日韓議員聯盟」，使兩國關係漸行好轉，尤其同年七月宮澤外相訪韓，與金東祚外長舉行會談，終於恢復了兩國正常關係。

最近數年來，日本對韓國輸出大量增加，韓國年年入超，尤其是一九七八年、七九兩年，入超均為三十三、四億美元，使復交十五年來，韓國對日貿易逆差，累計高達一百八十五億美元。雙方迭經商討平衡問題，始終未獲改善，致使兩國在經濟上的摩擦日益加深。至於韓國漁船在北海道、濟州道近海捕魚問題，雙方亦時起糾紛，影響兩國政治關係，到了朴正熙政府末期，因金大中等反政府份子，積極從事「反獨裁」、「要求修憲及恢復民主政治」運動，金大中等又遭逮捕入獄，日本國會及輿論，對此頗多批評；而韓國當局除指責日本干涉內政外，對日本與北韓之間的人事與經濟交流，攻擊得更為嚴厲，使兩國關係一直處於不協調狀態。

前年十月朴正熙被刺逝世，象徵著「維新體制」的結束，以親日著稱且為日韓復交功臣的金鍾泌前總理，繼承朴氏為民主共和黨總裁，金大中、尹潽善（前總統）等反政府份子亦均釋放復權，一時日韓關係前途，曾出現若干曙光。惟不久韓國內部因修憲、經濟不景氣、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倒產、失業等問題，交相激盪，學潮、工潮相繼爆發，社會秩序極為混亂，韓國政府遂於去（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宣佈全國非常戒嚴令，關閉大專學校，停止一切政治活動、限制新聞自由，若干日本報社駐韓代表亦被遣送回國；金大中、金鍾泌、李厚洛等二十六名政要，均分別以貪污、謀叛等罪嫌遭到逮捕；不僅使韓國國內震驚，日美兩國亦紛紛加以批評指責，致使韓國與日美兩國間所有一切定期協調機構如「美韓防衛協議會」、「美韓政策協議會」、「美韓經濟協議會」、「日韓部長會議」、「日韓議員聯盟」等均停止召開；一九八〇年度日本對韓一百九十億日元貸款，亦告停止。及至去年九月全斗煥繼崔圭夏當選總統，金大中案又正式以叛亂罪移送軍法審判，日本錯認韓國又進入軍事統治，並料金大中有判處死刑可能，除政府一再提出警告，要求慎重處理金案，否則將影響兩國未來關係外，全國所有大眾傳播機構亦紛紛指責韓國政府，並為金大中請命；民間若干團體且發起援救運動，要求政府出面斡旋。韓國當局不僅未予置理，反利用大眾傳播，以日本干涉內政為由，實施反日宣傳，至此，兩國關係已相當惡化。

今年一月雷根總統就任後的次日，即邀請全斗煥訪美，並定二月二日在華府會談，給予日本極大震撼。鈴木除指責外務省當局事前疏忽外，並立刻透過外交途徑，試探邀請全斗煥於返國途中，在日停留，與鈴木會談。結果韓國以國內正忙於「總統選舉人團」、「新總統選舉」、「國會議員選舉」為由，予以婉拒，使日本陷相當尷尬局面。

雖然雷根在發出邀請全斗煥訪美的同一天，亦以電話促請鈴木早日訪問華府，使鈴木挽回了一些面子，但美國重視韓國，信任全斗煥能改善卡特時所造成的美韓兩國不協調關係，已極明顯。日本對此，乃即見風轉舵。本年一月二十八日伊東外相與韓國駐日大使崔慶祿會談，除對全總統將金大中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表示欣慰外，且認阻礙兩國關係障礙業已掃除；決定即行恢復對

韓日元貸款；並對二月二日美韓會談，寄與甚高期待；同時希望在適當時日，邀請全總統訪日，舉行「日韓首腦會談」，以加強兩國關係。同日鈴木首相在記者會中亦表示即將恢復對韓日元貸款及召開停頓已達兩年半的「日韓部長會議」，以改善雙方關係。

全斗煥訪美回國以後，又於二月二十五日正式當選韓國第十二任總統，顯示全氏領導的第五共和已趨安定。全氏於三月三日就任總統，鈴木原有意親自參加其就職典禮，惟其時正值國會審議國家總預算的最緊要關頭，遂決定派伊東外相爲代表，攜帶鈴木親筆函件，前往參加。事後再分別與盧信永外長及全總統會談。

近年日韓交惡，原係日本政府所造成，此次伊東外相移樽就教，自爲韓國所歡迎，何況日本在韓國的對外貿易中，僅次於美國而爲第二大貿易伙伴，更何況日本每年還向韓國提供大量日元貸款。韓國在經濟正陷於困境之時，當然樂意與日本改善關係。惟自全總統訪美與雷根舉行高層會談後，韓國在亞洲地位已驟然升高，而在最近日韓會談中，韓國也佔了上風。我們從伊東外相與盧外長、全總統會談結果，即可見其梗概。

在兩國外長會談中，除了雙方同意今年四月在東京舉行「外長會議」、九月恢復「日韓部長會議」及儘早召開「兩國首腦會談」外。對伊東外相建議由日本斡旋南北韓會談一事，盧外長雖未直接答覆，但明白表示日本應正確認識北韓威脅的存在，等於婉拒了伊東的建議。在伊東與全總統會談時，全氏首先說明在美韓會談中雷根總統已確認了以韓國軍事力的加強來促進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安定的方針；暗示韓國國防充實後，日本自由與和平始可獲得保障。全氏又向伊東表示：韓國雖不要求日本在軍事上予以支援，但希望在經濟上多予協力；對於日韓貿易不平衡問題，希望以投資方式予以改善。三月四日伊東外相返國後向鈴木首相報告時，更坦率說明全斗煥總統以下政府首腦，一致表示韓國爲了對抗共產威脅，曾支出鉅額防衛費用，這些費用，間接也是爲了日本利益；故爲了韓國安全，日本應加強對韓經濟援助；另對北韓輸出物資，也正式要求予以限制，因日本輸往北韓之卡車、高速艇、通訊機、潛水衣等均已被轉爲軍用，近年來被韓國捕獲的自陸上或海上侵入之北韓工作人員，其衣服、裝備、通訊器材，均係日本製造。

伊東訪韓結果，雖然已改善了兩國若干關係，但韓方所提出的各種要求，尤其是加強對韓經援及限制對北韓輸出物資，將增加日本的極大困難。故日韓關係前途，並非完全可以樂觀。

五、對蘇外交的是非

日蘇兩國雖曾於一九五六年十月發表「共同宣言」恢復外交關係，但和約迄未簽訂，主要係由於戰後被蘇俄強佔的日本北方

領土——齒舞、色丹、國後、擇捉等四島，迄未歸還所致。故二十餘年來，雙方關係，始終在不即不離時好時壞的狀態中。最近數年來，更由於蘇俄在遠東不斷擴張軍力，連國後、擇捉、色丹亦駐有重兵，構成對日本嚴重威脅，並使兩國關係更趨惡劣。

自蘇軍入侵阿富汗及伊朗問題發生後，日本爲配合美國政策，曾對蘇俄採取了若干強硬措施，如杯葛莫斯科奧運、對蘇實施經濟制裁等。今年一月，日本閣議決定，以二月七日爲「北方領土日」，全國舉行盛大集會，以示政府收回北方領土決心；但自二月二十三日布列茲涅夫在蘇俄共黨代表大會上針對雷根新政府的強硬政策發動和平攻勢後，日本政府與財界在心理上又發生了動搖。首先出現的是三月六日決定緩和對蘇經濟制裁，積極圖謀恢復對蘇經濟合作，蘇俄對外貿易部次長伊華諾夫預定三月下旬訪日，與日本協商揚布魯克油管（由西伯利亞通往西歐的天然瓦斯管）建設計劃問題。依照此一計劃，日本進出口銀行及市中銀行將於五、六年內提供信用貸款三十億美元，作爲由日本輸入鋼材等建設資材之用。此外，日方將再提供大量日元貸款。協助蘇俄「第三個遠東森林開發計劃」，基本契約，不久即可簽訂。日本此舉，雖以經濟爲重點，但事實上無異是資敵行爲。

蘇俄在對西方國家發動和平攻勢^②的同時，其駐日大使館亦曾正式通知日本外務省，謂波里揚斯基大使希望與鈴木首相舉行會談。經鈴木與伊東會商結果，同意先由伊東外相與波里揚斯基先行會談，視會談結果，再決定是否再舉行兩國首腦會談。基於上項決定，三月十五日下午伊東與波里揚斯基在日本外務省舉行了兩小時會談。在會談中，波里揚斯基曾將布列茲涅夫在蘇聯共黨大會上所作和平建議演說中對日本及對遠東政策部分，加以說明，要求日本合作。關於對日政策部分，首先說明蘇俄對日本善鄰方針迄未改變，惟對日本「軍事主義化」與「日美中（共）結合」政策，表示遺憾，強烈要求修改；關於遠東政策部分，主張「釀成互信」，要求與遠東各國作實務協商，交換意見，要求日本切實檢討。對北方領土問題，波里揚斯基仍堅持過去主張，毫無退讓之意。因此日本當局認爲蘇俄欲藉此大會談在未來的「日美高層會談」中發生對日的牽制作用，對改善日俄關係，毫無裨益。因此，鈴木、波里揚斯基會談乃至兩國首腦會談，短期內絕難實現。

六、結 論

綜觀上述，日本最近外交動態，無論是對中共、美國、韓國、蘇俄，其所採取的措施，處處顯示出現實短視，徬徨無主。今後日本如再不確立正確的外交原則，與美國爲首的自由國家共同合作，而僅顧及短期現實利益，則不僅其國際地位，將日益低落，連經濟大國美譽，恐亦難保。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脫稿於紐約。

^② 根據三月九日華盛頓《美聯社》報導，九日雷根曾與訪美的西德根舍外長會談，當時海格國務卿表示三月六日美國已收到蘇俄布列茲涅夫致雷根親筆長函，函中強調美蘇首腦會談之重要性，希望早日會晤。同時西德、法國等西歐國家，亦均收到同樣函件。